



曹鹏 张立宪 编著

怎样当 自由撰稿人

没有单位的记者



光明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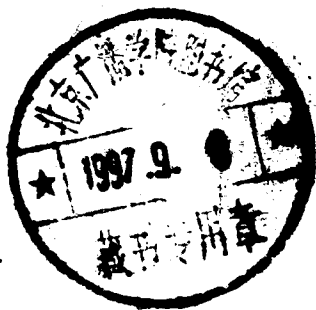


493389

493389

没有单位的记者： 怎样当自由撰稿人

曹 鹏 张立宪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单位的记者：怎样当自由撰稿人 / 曹鹏，张立宪编
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3

ISBN 7-80091-928-5

I. 没… I. ①曹… ②张… III. 记者-工作-研究 IV.
G2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795 号

G214.2

CP

10

293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2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091-928-5/G · 385

定 价：1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自由撰稿人浮出水面	(1)
何谓“自由撰稿人”	(1)
何以“粉墨登场”	(13)
给个什么“说法”	(31)
第二章 自由撰稿人素描	(44)
做一名“记者”	(44)
没有记者证	(54)
“第三只眼睛”看社会	(65)
“票友”们	(74)
第三章 批评自由撰稿人	(85)
“亢”与贪	(85)
吹鼓手	(91)
想当然“客里空”	(97)
窃稿人	(106)
第四章 自由撰稿人何去何从	(114)
周末版进入相持阶段	(114)
自由撰稿人难做了	(126)
职业前景	(136)
第五章 做个自由撰稿人	(151)

一条切实的路	(151)
首先是记者	(164)
学会保护自己	(178)
第六章 寻找新闻	(190)
什么是新闻	(190)
新闻发现学	(199)
抢好“第二点”	(209)
第七章 不拘一格写文章	(222)
无招胜有招	(222)
新闻文体与新新闻文体	(233)
特写与“大特写”	(243)
评戏与写“星”	(258)
第八章 自由撰稿人不自由	(271)
社会控制	(271)
职业道德	(277)
结束语	(285)

第一章 自由撰稿人浮出水面

1991年，当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进行采访时，被采访者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他只有这样回答对方：“我原来是一家工厂的，但现在已不在那儿上班了。我也不是哪家报社的，但我要采访你……”

几年之间，越来越多的接受“自由撰稿人”采访的人们，已不需要接受对这一名词的若干解释，以打消他们从前曾有过的若干疑问；几年之间，“自由撰稿人”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个体行为，而已成为一项颇为热门的新兴职业，一个颇为可观的社会群体，一种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何谓“自由撰稿人”

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其时代特征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世界变化快”。一些事物飞快地崛起形成一种潮流，一些事物飞快地消失成为一段历史，昨日的异端成为今日的常态，今日的时尚正是昨日的弃物……见多了诸般变化的人们习惯了“见怪不怪”，也养成了对新事物宽容的涵养。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自由撰稿人”和许多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萌芽而壮大，其“星火燎原”之势足以令社会学家瞠目。

尽管有关部门没有（现有也不可能）对这支队伍进行统计研究，但其发展膨胀之快却是每一个与传播媒介有关的人都会产生

的直观感受。90年代初期,以“自由撰稿人”自居并将其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人还寥若晨星,而在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的专职自由撰稿人保守地估计也可数以千计,而经常自诩为“自由撰稿人”及干着“自由撰稿人”性质工作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其分布范围也从大都市扩展到县镇、乡村,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势。整天忙着处理大量来信来稿或接待大量投稿者的报刊编辑会有一种同感:原来被称为“业余作者”或“特约作者”的这些人,现在大多已在名片上印上了“自由撰稿人”字样。几年前,一位自由撰稿人进行采访时老爱说“我是某报社的特约通讯员”;现在,同一位某报社特约通讯员在进行采访时却爱说:“我是自由撰稿人。”

当“自由撰稿人”达到某种程度上令人耳熟能详的认知程度时,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不甚了了。甚至有的人可以先将自己视为“自由撰稿人”再根据自身的特点为“自由撰稿人”下一个适合自己情况和心意的定义,这使得“自由撰稿人”成为一种类似“万金油”般的概念,乃至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篇名为《古典名著多诋儒》的文章中,分析中国古典名著何以对儒家人物和思想多有贬低的缘由时,其中之一就是“名著作者多为自由撰稿人”,称这些古代“自由撰稿人”(也可称之为现代“自由撰稿人”的鼻祖)“其作品能够写自己所想,不迎合他人,敢于针贬时弊,不像御用文人看皇帝眼色行事”云云,将“自由撰稿人”这一新兴事物的诞生年限前推了几百年,既有数典不忘祖的雅量,又可找到“历史悠久”的佐证以壮自己的底气。

一面旗子可以随便被人打,我们便可以想象这面旗帜下聚集的人员成分是如何芜杂。尽管我们不是“出身论者”,也从不会怀疑“自学成才”这个硬道理,但一位废品收购站的职工,向各报刊发出大量油印稿件,并在文后注明自己为“华东地区六大自由撰稿人之一”,我们仍不能不感到惊讶,产生怀疑。还有一些靠剪刀浆糊来拼

凑文章的文抄公，也以“自由撰稿人”自居，不独使社会对“自由撰稿人”产生反感，也使这一旗帜下的其他人等欲将此公清理出队伍而又无可奈何——这支队伍不单缺乏约束机制，甚至也缺乏“命名”机制，这使得有人误认为当一名或自以为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要比做一名厨师或司机容易得多，尽管撰稿这活儿并不比做饭或开车容易。

这不能不归于“自由撰稿人”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

何谓“自由撰稿人”？

想从现有辞典及新闻学著述中找到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和论述，这种尝试是徒劳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自由撰稿人”是个新名词、新事物，而非罗贯中、吴敬梓们所处的时代即有。那么，这一名词从何而来呢？问一些资深“自由撰稿人”，他们说是听别人这么叫的；再追根溯源，发现是参照外国新闻界的叫法。他们听说西方如此称呼从事这种性质的职业“写手”，便把这一称谓套用了过来。自由撰稿人在西方传播界确实存在，但多是指一些资深评论家或时事专家，他们不受雇于某一媒体，却往往能把握整个传媒界的口径。一名以“此间观察家以为”口吻评说时事的权威自由撰稿人，其稿件一俟写就，往往是全国报纸都在同一天争相刊登。所以，尽管西方自由撰稿人不是隶属于机构的专职新闻记者，但其对新闻的参与程度却被纳入社会主导话语系统，而非我国自由撰稿人在新闻传播系统中所处的非主流地位。同时在西方，更广义的“自由撰稿人”指的是“自由作家”。其写作文体无所不包，且其写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虚构类作品中，而这样的写手，在我国却又是不称其为“自由撰稿人”的。由此可见，“自由撰稿人”这个舶来词，用在我国，又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自由撰稿人”，顾名思义就是自由的写稿之人。但这个过于宽

泛的定义，几乎可以将所有的“爬格子”的人纳入其中（事实上有许多自诩为“自由撰稿人”的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话，首先要看“自由”意味着什么。所谓“自由”是指写稿者与其稿件投向及刊发的报刊媒体间不存在工作隶属关系和行政领导关系，所以写稿者相对于媒体方来说是“自由”的，他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他可以投给这家，也可以投给那家；他没有工作任务的限制，也不受单位纪律的拘束，这种“自由”使得自由撰稿人与隶属于具体某家媒体的专职记者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撰稿人等同于大众传播领域的“个体户”，即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独立创业，自主劳动，不隶属于任何通常意义的单位和部门。

将撰稿作为一种职业，这使得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目的迥异于原来的业余作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业余“爬格子”的人对其写稿所得的报酬持这样一种超脱的态度：“谁能靠那点稿费过日子，无非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挣个烟茶钱，外加一杯咖啡两块方糖’，聊以自慰，足矣。”他们的稿费多是用来买几本书或看两场电影，对生活本身并无多大影响，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是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证明自己的才华，得到周围人和社会的承认等等，在物质利益方面考虑得较少。而靠稿费来养活自己，将稿费作为自己唯一或主要生活来源的职业自由撰稿人，必须为自己挣得最大限度的稿费，这是他们的写作态度与业余作者的不同之处。

我们还需要澄清的是，“自由撰稿人”撰写的是什么稿件。一位自由撰稿人的写作范围可以很广，“哪样来钱写哪样”，并且其写作内容也完全可以自作主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自由撰稿人对新闻稿件、纪实性作品、小说、诗歌、散文甚至影视创作等均有涉猎，但按照这几年自由撰稿人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观念和叫法，类似王朔等的“作家个体户”不会被称为“自由撰稿

人”，而是被称为“自由作家”。从这个角度上讲，“自由撰稿人”与“自由作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自由作家”是指从事虚构性文学创作的人，他的作品追求的是艺术性；而“自由撰稿人”则是指从事纪实性新闻采写的人，他的作品追求的是真实性。所以“自由撰稿人”更大程度上是从属于新闻界而非文艺界，许多“自由撰稿人”也是以一名新闻工作者而非文学创作者自居，尽管他可能也同时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如同一位职业记者也可能写小说一样。我们往往看到一些自由撰稿人称自己为“身在体制外，不持记者证、介绍信也能比一般记者采写出更多更好更出色的新闻纪实性作品的记者个体户”，但他们并不会拿自己同一些专业作家相比。

1995年8月，中国女作家张爱玲在美国溘然长逝。如果我们来寻觅这位已故著名女作家的履历的话，我们会发现她也被列入“撰稿人”之列。本世纪40年代上海一家著名的英文杂志《20世纪》的封面，登有部分撰稿人的照片，右上角便为张爱玲的玉照。那时没有公有制的说法，张爱玲也像当时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卖文为生”，而没有从属于某一个单位。如果我们愿发思古之幽情的话，也尽可以将张爱玲视为自由撰稿人的先驱。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张爱玲和现行自由撰稿人的明显区别。张爱玲是以散文、小说扬名文坛，其为《20世纪》所撰稿件即为《更衣记》、《中国人的宗教》等散文，这与现在以从事纪实性新闻写作为主并爱以“记者”自居的自由撰稿人有较大分野。

在没有铁饭碗的旧时代，所有的凭借个人的知识技能来谋生的知识分子都被视为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等。那时的专职从事新闻采写的人员被称为“访员”、“访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老报人对其“访事”生涯不无辛酸的回忆。但这些没有铁饭碗的“访事”仍需要受雇于某家报社才能开始其自由职业生涯，这与现在的自由撰稿人也有不同，职业的自由撰

稿人尽管主要从事采写新闻报道,但其身份是自由的,其人事关系并不隶属于某家媒体。

对于没有记者证,与媒体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自由撰稿人来说,人们又往往将其与特约记者、通讯员、“土记者”等编外新闻工作者混同起来。特约记者是指应新闻机构之约完成一定采写任务的编外专业人员,通讯员是指为新闻机构采写新闻、反映情况的编外新闻工作人员,“土记者”则是对来自基层的非专业新闻报道人员的称谓。自由撰稿人与这几类新闻工作人员的工作特点确有相同之处,但其区别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前者为职业化的专职新闻采写人员,后者多为兼职的、业余的新闻工作者,如有的特约记者为地方党政部门或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或本新闻机构之外的新闻工作者,或作家、学者等专业性人才;通讯员则多为当地党政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土记者”的工作重心更向其本职工作倾斜,而对其业余从事的新闻采写,则并没有自由撰稿人所必需面临的生存的压力。尽管有的自由撰稿人其前身就可能是某一新闻单位的特约记者或某一地区的“土记者”,但其成为自由撰稿人并不是称谓上的简单更改,而是经历了从业余到专职的转化。即使有的自由撰稿人本身仍有固定的其他职业,但其之所以能自称为或被人视为自由撰稿人仍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其撰稿工作在其全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需达到一定程度,所得稿费在其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需达到一定程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写手,可有可无、可干可不干的写手是不会被称为“自由撰稿人”的,而仍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业余作者”或“土记者”。正如一名撰稿人在谈到另一位写手时这样说:“他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他本身有工作,并且发稿量太小,不是那么很‘自由’。”尽管这位仁兄本身也有一份机关工作,但他仍认为衡量一位自由撰稿人应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写手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度”,像时下中国足坛流行的一样,要达到

一定的“职业化”水准。

论及此处，我们已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界出现的“自由撰稿人”，不同于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其他类别的边缘新闻工作者或其他自由职业者，而完全是一个新兴的职业、新兴的社会群体、新兴的事物，一个具有全新意义的概念。

经过如此一番甄别区分，我们可以这样为“自由撰稿人”定义：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而又从事采写新闻报道的自由职业者。

有了这个定义，却并不能用其将现在社会上号称“自由撰稿人”的人完全涵盖，因为这一社会群体的现实构成远比我们这个定义要宽大得多、芜杂得多。究其原因，一者是因为一个新的概念从产生、发展到逐渐成熟总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认错对象，拉错盟友，有的人也难免搭错车，如曾被《中国日报》载文介绍的“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之一的黄燎原是搞音乐评论的，称其为艺术评论家或“乐评人”也许更合适些，当然他也是个自由职业者；另一位尹慧的成名作则是散文集《晚风中的共和国》，我们可将其视为“作家个体户”。事实上，有许多从事文学创作或散文写作的“文化个体户”被人冠之以或自居为“自由撰稿人”，但他们并不符合我们所下的这个定义，他们的写作道路也迥异于现在大多数自由撰稿人。我们只好认为这是“自由撰稿人”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不明确造成的，我们也只好将他们排除在我们设定的这个概念之外，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

原因之二则是，因为一旦一个新事物为大众所接受并且形成一种潮流，归附于这一旗下的人自然就多了，其中也不乏滥竽充数者。如一些专门靠拼贴、剽窃为生的“写手”，往往以“自由撰稿人”自居，而其“撰稿”过程中既不做必要的采访、调查工作，也不下写作功夫，只靠抄抄编编过日子，有的“自由撰稿人”更是打着这个

旗号招摇撞骗，却无作品问世，一幅“自由骗子”的嘴脸，与我们所设定的“自由撰稿人”的概念更是大相径庭。

以上两点，造成“自由撰稿人”队伍“乱花渐欲迷人眼”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撰稿人”依然是杆可以随便被人扯来打的大旗，如我们见诸报端的围绕着“自由撰稿人”做文章的文章，勾勒出“自由撰稿人”的众生相。

有的文章将自由撰稿人称为“职业写手”——

1993年4月，福州成立了一家“撰稿公司”，拥有百余名撰稿人员，社会上哪家单位、哪个部门需要有经验的代笔者，他们都可以帮忙，从中获取丰利。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创办该公司的目的在于促进更多的文化人有目标地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江苏某文化馆的专职创作员金某，日复一日的“坐班”生涯使他难以忍受。再三思虑，他毅然停薪留职，当起了“职业稿手”，专门撰写热点透视类文章。街上流行哪种时尚，他就会瞄准而上，挥毫疾书。由于他的写作手法娴熟，题材又好，每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为此，他常常懊悔：“过去简直是白活了。”

以上描述的诱人情景大概算是自由撰稿人的典型个案。

我们将自由撰稿人视为“另类新闻工作者”，而在诸多文章中又出现了诸多的“另类自由撰稿人”，如一些农村出现“土记者”一族，既不同于传统新闻学中定义的“土记者”，却类似于我们所定义的“自由撰稿人”——

目前，全国县以上电台、电视台有2500余家，报刊近8000种，众多的新闻媒体给“土记者”族一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1993年初，报刊扩版增刊大战正沸沸扬扬，半路又杀出一批新报刊，客观上造成了各新闻单位稿源更加趋紧，“土记者”们面对大好形势，个个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他们已不满足于发个“豆腐块”之类的小稿，也都学着“玩”起通讯、特写来。一篇篇来自乡村的稿件，似一束

束带露的蔷薇花，清香凉爽。“土记者”与正规记者相比，尽管很难写出触及社会变革中深层问题的重量级大特写，可他们也能立足“农”字唱出许多好戏来。当打工潮席卷全国之时，他们及时写出了《打工潮透视录》、《奔流到海又复回探析》等一批有力度的稿件，全面详细地报道了打工潮带来的利弊，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

安徽蒙城县农民于林才，跋山涉水，虽屡遭挫折，但仍写出《八天前受表彰贡献特殊，八天后免职赋闲在家》、《厂子倒了，集资人咋办》、《阜阳警车：我还有多少尊严》等深度报道，笔锋犀利，极富战斗力。

河南省唐河县桐河乡的金少庚，1993年在省、中央级报刊电台频频推出《猫，在农村失宠了吗？》、《六月，请您把好“危险之门”》等几十篇稿件。许多矢志不悔的文学青年，也终于认清了形势，纷纷转行给报刊写起了“豆腐块”。一批批部队新闻报道员返乡后也不甘寂寞，拿起笔讴歌新人新事，把家乡的名优土特产品介绍到海内外，为家乡经济腾飞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由撰稿人”热潮不独出现于城市、农村，也出现在军营、校园中。时下各报刊收到的来自部队的稿件，不少与军队工作无关，而多是社会热点透视、评论言论、生活小品等，军营中也出现了“自由撰稿人”但还是初级阶段，不如社会其他阶层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校园里的“自由撰稿人”却已规模大到可称其为“一族”，更是“边走边唱”，热热火火——

自由撰稿人这种潮流也涌入大学校园，就像股票和BP机一样，许多大学生一上手便玩得顺顺当当，一些能说会写的大学便形成了新潮一族：校园自由撰稿人。社会自由撰稿人纯粹以写作为其重要生活来源，而校园自由撰稿人却使自己的生活注入了另一种意义。

坐落在北京市石景山游乐园附近的中国新闻学院风景独好。

新闻专业本身贴近报纸、刊物，大学生们和新闻单位存在着一衣带水的关系，专业性质促使、刺激这些“准记者”们更为积极地加入采访写作行列。

94 级的郑志东，这位来自山西神池县的小伙子，敦厚、诚实的外表看不出他骨子里的灵气，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 1200 多篇新闻和文学作品，使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没有记者、作家的头衔，只是一个一度高考落榜参加工作又再次上大学的普通大学生。他自入校后，单在国家级报刊就发表了 70 多篇文章，如《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5 年 3 月 8 日和 4 月 22 日刊登的《孙素平举起〈半边天〉》、《翩翩女骑出深宫》，《中国环境报》发表的《古迹今尚在公德邈已远》以及《光明日报》发表后被《北京青年报》等五家报刊转载的《大学生一衣不洗何以成栋梁》等等。

在中国新闻学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准记者，他们除涉及新闻作品外，还兼有各类文学作品。丰硕的创作成果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很多：锻炼了他们的采访、写作能力；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基础；经济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补助，如《翩翩女骑出深宫》一文 120 元的稿费，能使郑志东美美地过上 10 天半月。

“自由撰稿人”一词可以滥用，也可以演化，如在一篇介绍从内地奔赴广州的自由撰稿人的文章，便冠之以一个新名字：“流浪记者”——

老何原在内地一家法制报担任采编部主任，由于与总编合不来，一气之下，夫妻双双辞去公职，闯荡羊城。

记得第一次上他家，一家三口还蜷缩在租来的房里。他们与其他“流浪记者”一样，没有广州户口，没有住房、公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然而他们没有把自己系在哪棵树上，完全靠写新闻挣稿费。白天，老何外出采访，与羊城正规军分庭抗争，抢回一批又一批“货真价实”的新闻，重点挖掘社会新闻及社会热点；其妻在家及时

将丈夫所采访的素材整理成文字，在羊城报界崭露头角。他们稿件采用率都在85%以上，大都能拿到千字百元左右稿酬。

前不久，老何乔迁三房两厅的新居。听老何讲，房租要1000多元。他们的写作也现代化了，购置了两台386中文电脑，现在每天可出20000字的“产品”。老何感慨地说：“当初南下广东，叫我们心惊胆颤。40多岁的人，拖儿带女丢掉‘铁饭碗’，的确下了很大的决心。每当想起当初的情形，真有点后怕”。

目前，广东的报纸火爆，数量仅居北京、上海之后，除了拥有一二十家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外，尚有仅限在广东省内部发行的“内部刊号”报纸近300余家。街头巷尾报亭报摊新面孔的报纸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正因为打得火热的报纸大战，给这些“流浪记者”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报纸必须扩大知名度和增强可读性，就期待一批有实力的“流浪记者”加盟，借以稳定他们的稿源。有10余年报史，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现代人》报改出日报后，其声称，绝大多数的稿件来源于“流浪记者”。

从江西、湖南等地来的小胡和小陈等20余名记者，穿梭于数十家报纸之间，许多报纸分别为他们开辟专栏，订题目出内容，提供采访线索。他们根据报社要求、命题采写新闻，捕捉社会热点。从总体评价，这些文章读来意味深长，文笔清秀，深受读者的喜爱。他们的稿酬自然是“特稿特酬”。这些“流浪记者”普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四五千元也不足为奇。

.....

在为“自由撰稿人”定义时，我们也曾考虑过用一种比较偷懒的方法，即将“自由撰稿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即上述我们所确定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广义的自由撰稿人则可指一切从事写作或业余从事写作的非专业人士（甚至那些古典

名著的作者),对其写作内容也不作划分。这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自由撰稿人的发展现状的,因为这杆大旗下已不分青红皂白地聚集了若干类“写手”,用狭义的定义方法不足以道尽。

但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定义方法。

广义的自由撰稿人概念,其适用性过于宽泛,宽泛得使这个概念的确显得毫无意义。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自由撰稿人群体,尽管从人数及规模上已颇为可观,但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来筛选,职业的而非业余的、固定的而非短期的自由撰稿人仍是屈指可数。但真正使自由撰稿人这支新兴文化力量产生社会影响,树起公共形象的,却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其意义也正在他们身上。

如果我们采用了宽泛的定义方法,无疑将使这一职业的独特性消失殆尽,使真正的自由撰稿人淹没在熙熙攘攘拥来挤去的人群中。

所以,我们仍采用这种严格的狭义的定义方法。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强调自由撰稿人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或准职业化,撰稿内容的新闻性与纪实性。

发展初期的不规范、不成熟使自由撰稿人群体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无序,这一职业的从业特点又使得各个自由撰稿人呈游离态,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及同业人员间的约束,社会也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有效管理和监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或号称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要比成为一名司机或厨师要容易得多,自由撰稿人群落成为一个人人都可踏足而人的不设防城市,而在这个城市中每位成员也可以尽情表演,为所欲为。我们曾见到湖南某市的一位作者投稿时用的是为自己专门印制的信封,上面除有地址姓名外,还有“青年作家·中国十大自由撰稿人之一”字样,去信询问“中国十大自由撰稿人”称号从何而来,其他人情况怎样?此君在回信中对我们的问题避而不谈,却附了一份